

李自成农民起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7.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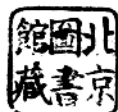
K248.4

2

李自成农民起义

智夫成

陕西人民出版社



A439692

李自成农民起义

曹夫成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11094·15 定价：0.3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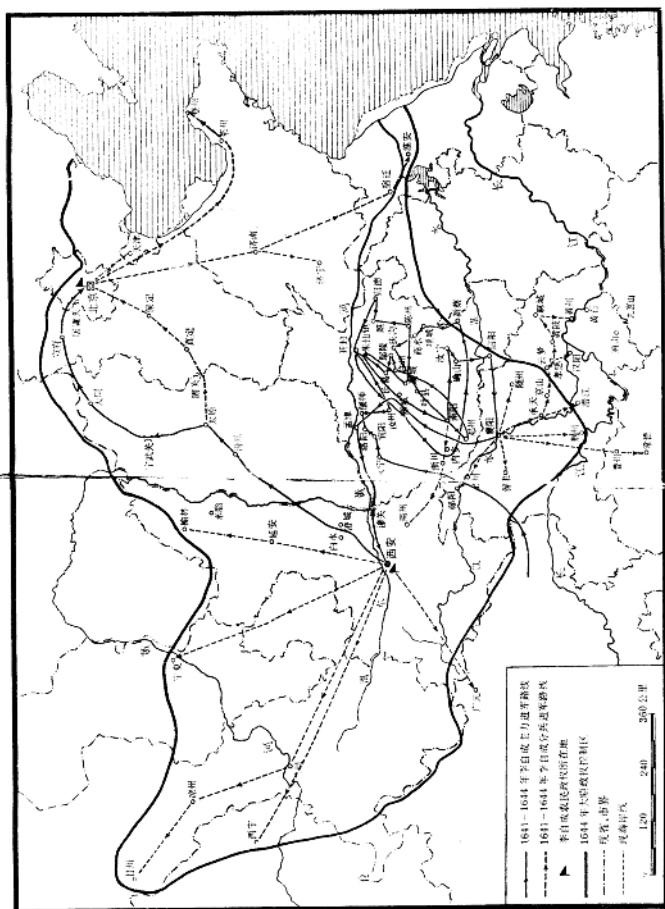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

张义藩 作



1641—1644 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斗争示意图

目 录

一、前 言	(1)
二、起义前夕的封建剥削和压迫	(5)
三、李自成参加农民起义队伍	(10)
四、随同农民军主力转战各地	(14)
五、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	(23)
六、革命斗争的纲领口号	(32)
七、大歼明军的几个著名战役(上)	(38)
八、大歼明军的几个著名战役(下)	(45)
九、一支组织严密、军纪严明的义军	(52)
十、在襄阳初建革命政权	(56)
十一、歼灭明孙传庭军的汝州战役	(63)
十二、在西安建立大顺国	(70)
十三、进取明都北京	(76)
十四、在北京时的革命措施	(85)
十五、起义军的社会经济设施	(92)
十六、起义军的反孔斗争	(98)
十七、革命关键时刻的路线错误	(106)
十八、起义军的失败	(113)
十九、这次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120)
注 释	(128)

一、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伟大民族。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不屈不挠的农民起义的革命斗争。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①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就是明朝末年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它在我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王朝末年，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极其黑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朱明王朝危机四伏，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当时，国内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对外有激烈的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还有争权夺利的矛盾。这些矛盾中，以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明王朝在与东北逐渐兴起的满族（即后金、满清）政权的战争中，财经耗费日益增加，这就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在争夺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的党争中，使政治更加黑暗腐败，也加重了人民的痛苦。由于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促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李自成农民大起义，就是明末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是明末农

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一场阶级大搏斗。

明王朝以地主阶级作为统治基础，拥有庞大的封建国家官僚统治机构，又有大量的维持其统治的军队，并利用孔孟之道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对全国人民实行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和黑暗的统治。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的英雄们，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传统，对偌大的朱明封建反动王朝，敢于藐视；对于这个貌似强大实质虚弱的敌人，敢于斗争。他们在斗争中，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阶级敌人无限仇恨。他们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经过艰难曲折的长期奋战，最后终于埋葬了朱明王朝的反动统治。这种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将在我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永放光芒。

李自成农民军的斗争历史，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前期和后期。前期（一六二九年底——一六四四年三月），从起义开始到占领北京，是起义逐步走向胜利的时期。在前期，大致上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六二九年底——一六四〇年底），由起义爆发至进攻洛阳前夕，是敌强我弱阶段；第二阶段（一六四一年一月——一六四三年二月），由攻克洛阳到在襄阳建立农民政权以前，是由敌强我弱向我强敌弱转化阶段；第三阶段（一六四三年三月——一六四四年三月），自建立农民政权到攻占北京，是我强敌弱阶段。后期（一六四四年四月——一六四五年五月），从起义军退出北京到李自成不幸牺牲，是起义军开始走向失败的时期。

在这场大起义中，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发挥了巨大的组织能力，他们把纷纷参加到起义阵营中来的

广大革命群众，组成一支庞大的农民革命队伍。在这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他们集中了群众智慧，得出了一套适应农民战争的战略策略。农民军粉碎了敌人围攻、诱降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策略，逐步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不断把革命引向胜利。农民军还提出了生动的斗争口号和明确的政治纲领，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制定了一些分配土地、发展农业和工商业的政策。

这场农民革命运动提出的“均田”纲领，在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均田”反映广大农民的要求，是对唐宋以来农民革命中“均平”“均贫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后来如象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中进一步所提出的土地纲领的前驱。它在农民革命斗争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这一场农民革命运动，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而且在思想战线上，也对反动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作了革命的扫荡。革命农民用革命的暴力行动，否定了“天命论”、“中庸学说”、“三纲五常”等儒家反动说教，有力地批判了腐朽的“孔孟之道”，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历来就是批孔的主力军。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比法家更为彻底，更为坚决。这次农民起义把反动孔学打得威风扫地，从而也推动了后来法家对儒家的斗争。

这次势如急风暴雨的农民大起义，摧毁了明朝地主阶级的腐朽统治，冲击了旧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横扫了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反动势力。在明末极端黑暗的社会里，正是

这场农民大起义所点燃起的革命火炬，照亮了历史前进发展的道路。

这场农民起义，又一次显示出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一旦革命精神焕发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就会创造出历史奇绩，就会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李自成是在明末农民革命战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李自成就是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中，在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的战场上，受到锻炼，不断提高，而逐渐成为统率百万农民革命大军的主帅的。他始终高举革命大旗，带领群众冲锋陷阵，使农民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革命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势，为农民反封建斗争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伟大的功绩，主要是因为他在当时激烈的阶级搏斗中，是农民向地主进行阶级斗争的闯将，他带领农民大众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他在革命斗争中能够依靠群众，听取比较正确的意见，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革命要求，采取了正确地敌斗争策略，因此，使斗争不断取得辉煌胜利。

从李自成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阶级为反抗黑暗、追求革命而艰苦奋斗的可贵本质。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起义斗争虽然终于失败了，但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英雄事迹，载入我国古代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中，流芳千古，永垂不朽。

二、起义前夕的封建剥削和压迫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起义前夕，正是明朝末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全国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正处在地主阶级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下。

朱明王朝后期，土地兼并日益盛行，大土地所有制急剧发展。万历（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二〇年）以来，潞王朱翊镠的庄田，多至四万顷；福王朱常洵的庄田，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总数也不下两万顷；其他皇亲贵族田地上万顷的，大有人在①。秦、庆、韩、肃诸王，霸占了陕西的大部分良田沃土。明末官僚显贵和乡绅豪富都以争夺田产为能事。官僚缙绅之家，田达千余顷的，五、七百顷的，为数甚多。河南的曹、褚、苗、范四大家族，各家都霸占良田千余顷。至于各地一般豪门富户，田多至数万亩、数千亩或数百亩的，更是不可胜数。

权贵豪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随意杀人和掠夺妇女，恣意兼并农民田产②。当时兼并土地的方法很多，有的假造契约，有的授意游闲恶棍，将别人的田产数目，写个“投献”书，献给权贵豪势之家，原业主如不同意，便送官府治罪。农民丧失土地的情况，极为严重，据记载，明末苏州、松江

地方，“有田者什一”，无田人竟占十分之九⁴。农民在地主疯狂兼并下，丧失田地后，扶老携幼，流亡他乡；或者为地主耕田，沦为佃农。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极其苛重。他们剥削农民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租额极高，以福建、河南、陕西的有些地方为例，各类地主的租额往往高达收获量的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⑤此外，地主们并巧立名目，对佃农还要进行额外勒索。又如江浙等地，一般都是定额租。稍遇歉收，农民完租以后，已是屋中空空，只好一手交租，一手向地主借高利贷。恶霸地主大斗进、小斗出，高利贷利率很高，一旦借到高利贷，就很难还清。高利贷就象毒蛇一样，缠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

地主视佃农如奴仆，任意役使，甚至私设公堂，私立牢狱，随便打骂，以至予以处死。“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⑥有多少贫苦农民惨死在地主阶级的皮鞭下！佃农全家常常为主人干各种杂活，遭受各种压榨，贫苦不堪，往往冻饿致死。

农民除了遭受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以外，还要遭受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的压迫和剥削。明朝政府为了维持统治者荒淫豪华的寄生生活，为了弥补日益增多的财经开支，也加紧了对农民的疯狂搜刮。政府除了征收正额赋税以外，又屡屡加

派。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以后，加派“辽饷”；天启（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时，又有关税、盐课及杂项的加派；到了崇祯（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年间，又加派田赋，增派“剿饷”，添派“练饷”。仅这“三饷”一项的加派，总计就年达白银二千万两^⑦，超过正赋一倍以上。

全国性的田赋加派外，还有地方上的加派，公开的加派外，又有暗中加派。在一年内，“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当时官更多靠捐钱买官，把作官当做买卖，坐官以后，就抓住一切时机贪污受贿。贪污盛行，人民使用三个钱，尚不能纳足一个钱的赋税^⑧。这些无穷无尽的横征暴敛，逼得人们倾家荡产。

同时，各项差役层出不穷。“差役之外，复有差役”。勋戚官僚享有“优免”特权，可以减免赋役。至于一般地主，则以“飞洒”、“诡寄”诸手段，把赋税徭役转嫁给贫苦农民。繁重地力役负担，全都落在贫穷农民的肩上。有些穷苦农民，为服徭役，不仅耽误农业生产，而且长途跋涉，又饥又累，有的死在外面，弄得家破人亡。

贫苦农民无力完税服役，再加自然灾害，被逼得破产逃亡，夫妻离散，饥寒交迫，卖儿鬻女，流浪行乞，甚至死于沟壑，造成村无吠犬，“乡乡几断人烟”^⑨。这就是明末农村凄凉破落的景象。

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加重了天灾时疫的蔓延流行。明末数十年间，水、旱、蝗、疫等灾害，连年不断。愈到后来，愈为严重。有的时候，一年连闹

几种灾，或一种灾一年连闹数次，受灾地区很广。明王朝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官府不仅不认真赈济灾民，反而乘机从中渔利。官吏们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顾灾重民饥，依然催科如故。往往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逼迫留者交纳逃者钱粮，生者承担死者徭役。凶官恶吏，如狼似虎，严于催科，急如星火，稍不遂愿，就绳捆鞭打。

·残酷的压迫剥削加重了天灾，天灾肆虐更暴露出社会的黑暗。在天灾人祸的折磨下，穷苦人们走投无路，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据记载，公元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④，陕北地方，一年无雨，庄稼颗粒无收，草木枯死。人们没有粮食吃，到八九月间，则争食山中蓬草；十月以后，蓬草采尽了，则剥树皮为食；到了年底，树皮剥光了，又掘山中石块为食，食后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⑤。真是饿殍满野，满目凄凉。

另一方面，皇族贵戚、官僚大吏、豪富地主等，在劳动人民的血泪和白骨上，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例如洛阳的福王朱常洵，家资亿万，粮食和财物堆积得好象小山一样。他们过着骄奢淫逸、腐朽堕落的罪恶生活，与广大人民极端贫困的生活，恰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尖锐的贫富对立，促使着广大农民的觉醒。

封建统治者在疯狂掠夺农村的同时，它的魔爪也伸向城市中的工商业居民。明朝政府派遣“中官”（即宦官、太监）当作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地，“假开矿之名”，“横索民财”^⑥；即使米、盐、鸡、豕，“皆令输税”，结果弄

得“民不聊生”^①。明朝政府还令商人代为采办货物，商人们有的“输物于官，终不得一钱”。再加上税收层层加码，造成工商业者纷纷破产。从而激起了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促使明代后期以来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明朝政府为了镇压反抗活动，加强了由皇帝直接操纵的东、西厂和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的统治，派出特务到处监视人民言行，使全国人民都处在恐怖统治之中。各阶层人民毫无言论自由，一不当心，就会被捕入狱。这引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普遍反对，造成明末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和扩大化。

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国家对劳动人民的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造成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坏，促使社会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统治者已经不能再照旧统治下去了，广大人民群众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一场巨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三、李自成参加农民起义队伍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斗争，压迫愈重，反抗愈烈，这是一条阶级斗争规律。明末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广大劳动农民陷入贫困、破产、死亡的境地。正如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所指出的，“这种压迫越是**暗无天日，农民现在的觉醒就越有力量，他们的革命冲击力就越难阻挡。**”^①农民大众在斗争中逐渐懂得，为了生存下去，就得拿起武器，举起义旗，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推翻明王朝的黑暗统治，改天换地，打出个翻身解放的新时代。

暗无天日的压迫剥削，是爆发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所以，明末农民起义的怒涛，一旦爆发，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磅礴于各地。

在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陕西发生严重灾荒。澄城知县张斗耀，在饥荒的岁月里，依然鞭打人民，严催赋税。二、三月间，青黄不接，饥民数百人，在白水县农民王二领导下，在澄城县举行起义，打开牢房，杀死张斗耀，接着联合饥兵，攻打蒲城、韩城等地。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明末三饷加派，不论土地好坏，一律按亩征收，摊派不均，陕北尤感赋税沉重，贫穷农民的生活更为痛苦。当时陕北地区交通不便，遇到灾岁歉年，外地粮食不易接济，米价